

鞏固與擴大民主：台灣的國家發展戰略

●賴怡忠／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主任

壹、前言

民進黨在2005年三合一選舉大敗的結果，出現許多檢討的聲音。如果由得票率來看，民進黨的得票率與上次的差別並不是太大，差距在3%左右，但由於單一席次勝者全拿的選舉，導致得票率與當選席次的重大落差。因此針對這個百分之三的問題，出現兩種不同方向的檢討聲音。第一種是認為民進黨因為這一年來其執政失去基本價值，導致深綠力量的不滿而未出面支持，因此造成民進黨的敗選。另一種思考方向，則是認為尋求政治穩定的中間選民，因為民進黨的清廉形象已經消失，再加上「馬英九效應」，使得這些中間選民此次將票投向泛藍陣營。

這兩種思考導致民進黨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策略。認定是民進黨失去基本價值而在選舉失利的看法，則認為要再度強調「台灣主體性」，防止台灣向中國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上的過度傾斜。強調透過新憲同時來燃起社會的改革熱情；以同時解決台灣憲政體制不正常所導致民主癱瘓與國際封鎖的問題。

至於認為是中間選民背棄民進黨的思考者，則認為民進黨必須堅持清廉形象，在

兩岸政策上採取與中國的和解路線，在現存的藍綠政治分歧上尋求某種程度的「和解共生」，以爭取「中間選民」的回頭支持。

不管民進黨是如何檢討自己，由於台灣的民主改革力量還是與泛綠陣營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關心台灣民主與國家安全的朋友們，自然對民進黨的未來發展必須保持密切關注。同時對於「馬英九現象」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因為這些因素對台灣的未來走向會設下客觀的限制與機會，都值得我們的高度關心。

本文試圖對於台灣的改革力量及其所面對的挑戰，提出個人的觀察，同時結論出「鞏固與擴大民主」是台灣國家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改革力量尋求新的價值定位，並對國家發展問題提出個人的看法。

民主改革力量的困境

由於民進黨在台灣的政治發展上，一向扮演著捍衛台灣主體意識、追求民主改革、與尋求社會正義的角色。也因此現階段民進黨所出現的問題，會被認為是代表這幾股要求的政治力量呈現弱勢，使得過去透過政治力的介入，來改變資源分配與

議程優先順序的能力也隨之下滑。

這個發展實際上顯示極為有趣的現象。民進黨過去的成長，是在台灣社會尋求主體性、民主、與公平正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這股以民進黨為政治代表的社會力量，在民進黨選舉政治表現最好的時候，卻出現對民進黨政治影響力有著動員疲乏與衰弱無力的情形。對民進黨失去理想與價值的社會批評，實際上反映的，不正是這些代表理想與價值的社會力量與團體，其對民進黨政治議程的介入能力已經大幅喪失的象徵嗎？

另一個對民進黨批評的焦點，在於執政沒有方向感、決策前後反覆、以及治理無能。要展現清楚的執政方向感，除了要能夠堅持理想與價值外，還包括面對現在所處環境有清楚的認知，以及發展出一個合理可行的因應戰略。在「戰略清晰」的指導下，建構執政的優先順序，以及面對問題如何尋求妥協的判準。唯有確立戰略、目標、優先順序後，前述遇事反覆不定的問題才能儘量避免，同時也可以給予民眾一個較為清楚的一致性。

至於治國無能的批評，實際上表示，民進黨還不知道如何駕馭國家機器與官僚系統。這意味著除非知道如何利用國家機器與官僚系統完成改革的議程，否則不可能知道如何改革這個機器與系統本身。說實在的，首次執政的團隊，一定都會出現「生手上路、跌跌撞撞」的情形，只不過程度多少而已。1992年美國民主黨在睽違十二年後奪得政權，也出現與台灣類似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有人說民進黨不能代表整個泛綠，而泛綠又不能窮盡台灣追求改革的民眾，更甯提台灣本身，因此認為對

民進黨這幾年的問題，認為沒什麼大不了。

也有人認為民進黨這幾年的問題是領導者本身，把陳水扁與民進黨的路線以及台灣分開。換句話說，是陳總統「自己」選舉掛帥與媒體民調治國、是陳總統「自己」失去理想，是陳總統「自己」不會用人，是陳總統「自己」唯權力是尚。這都是陳總統一個人的錯。

對於說這些話的人，我希望指出一個事實，以陳總統本身的學養來說，他不僅從小到大都是第一名，更是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的優等生。這事實表示陳總統在1960-1980，可算是台灣那一代受教育中的頂尖，尤其是陳總統沒有出國留學的經驗，凸顯他是中華民國教育下最具原汁原味的人之一。這樣一個台灣菁英在今天面對問題時所出現的窘境，與其說是他個人的因素，還不如說是當時台灣教育的根本失敗。如果說這個問題是當時的教育系統所致，那麼這意味著在1950-1990年受教育的整整三代人，其基本訓練都可能有不足之處。換句話說，陳總統的錯，與其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還不如說這個現象反映了今天三十五至六十歲這個世代訓練不足的集體困境。實際上如果我們再看今天立法院的亂象，以及社會是非與價值逐漸崩解的情形，這個「集體智能不足」的現象似乎是很明顯的。

「馬英九現象」的挑戰

馬英九在這幾年的崛起，所出現的馬英九現象，實際上表示這幾年在政黨輪替後台灣民主改革所出現的問題。這與小馬哥是否受媒體青睞而刻意包裝出「不沾鍋」等關係不大。

馬英九就任國民黨主席後，開始積極發言，包括重新定義國民黨與台灣的關係、對中國統一的想法、對外關係的作為等。但是馬英九提出的幾個主張，「國民黨的政策是統一」、「與大陸簽署中程協議」、以及「行憲而不修憲」等，竟然在執政黨與台灣民間沒有引起激烈的討論，這個現象才令人感到驚訝。因為這些問題都與台灣前途與發展有關，照理講應該會引起一些討論才是。

在一項「台灣智庫」於2006年1月8日所發表的民調上，支持馬英九所稱「統一」政策的民眾只有6.6%，然而最重要的是，近九成民眾都支持陳總統有關台灣未來的定調，亦即認為台灣前途不應該預設結果，要由台灣人民決定。這也意味著台灣民意的主流，與其說是在統獨之外佔近六成的「維持現狀」，還不如說是要求台灣人民能掌握決定前途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這項與民意明顯脫節的主張，提出後於台灣社會像是風去了無痕般，同時也沒引起政黨的討論，這是十分奇特的狀況。

此外，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國民黨？馬英九有關台灣的發言似乎表示馬英九這個人有更強的意識形態取向，意圖在歷史觀、執政觀上，根據其所擁有的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與台灣的關係。這也是為何會出現「透過台灣連結中國」，「行憲而不修憲／制憲」等主張。也因此國民黨黨部前所掛的兩幅人像不是沒有理由，因為這是馬英九建立其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連結的重要窗口。亦即透過「抗日」，使台灣與中國民族主義各自不同的歷史經驗，在「對抗日本」的口號中獲得統一。從這個

方向來看，「反日」或「抗日」會是未來的馬式國民黨語言的核心之一。意即透過「反日」操作，來篩選何為「進步」或「反動」的台灣人，並與中國民族主義進行連結。

這也意味著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或其意圖改造的新國民黨，會沿著「反日」的軸線進行新的切割，重構當時的歷史圖像，以建立國民黨新的執政多數。

此外，目前普遍的社會氣氛是期待一個相對溫和穩定，前後一致，有能力的國家治理。而馬英九主席所傳遞的社會形象剛好與這樣的社會氣氛有若合符節之處。因此即使馬英九的歷史圖像並不為大多數台灣人民所接受，但是現在影響台灣人民的主要選擇，恐怕還是尋求社會穩定，以及希冀一個在言論與思想是前後一致的社會領導者的心理。當然馬英九主席廣受媒體的寵愛，使得與馬英九直接相關的種種問題，在雙重標準下被輕輕帶過或甚至略而不提。但現在與其說是馬英九本人不沾鍋的能力高強，還不如說這是在目前的媒體政治作用下，社會心理集體投射的結果。而沿著這樣的社會心理會出現的，應該是台灣社會走向「保守化」的先聲。因此以「愛台灣」的政治召喚，以及推動「改革」所喚起的熱情，在現在的台灣社會，可能較難發揮作用。

台灣面對的問題

如果談到台灣所面對有關生存的問題，有來自安全、經濟與政治三個面向的挑戰。基本上是在安全上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在經濟上面臨全球化對台灣的壓力以及中國經濟的磁吸作用，在政治上遇到強化民主治理與凝固國家認同等問題。這些

是較為基本的問題，至於諸如所得分配惡化、黑金、社會信任度下降等問題，比較可以說是這些問題所衍生出的其他問題。

以中國來說，中國對台灣實際上有幾層挑戰。中國至今仍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海爭端，在去（2005）年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單方面設定台獨的定義權，以及為「非和平手段」建立法律基礎，使台海緊張有增無減。中國對台針對性的軍事準備，以現在的趨勢來看，也會在2007年左右開始轉變台海戰略均勢，並可能在2020年達到攻台致勝的絕對軍事優勢。

中國也在國際上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不僅台灣的邦交國數目在減少，同時台灣在國際組織的參與空間上也被壓制。而連區域的經濟整合上，中國也對亞太國家施加壓力，意圖造成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上被邊緣化的效果。

在經濟上，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經濟體系有新的整合，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加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要素價格均等化」原理作用下的結果，紛紛出現製造業外移，以及服務業委外經營的結果。台灣的製造業在尋求低成本的要求下，移居海外，尤其是中國，成為重要的選擇。如果產業升級未完成，這樣的製造業外移自然對國內形成社會失業，所得下降與貧富差距加大的結果。台灣在還未完成產業轉型前即發生製造業外移的現象，是全球化給台灣的第一個挑戰。這在台灣位於一個對台灣充滿敵意，但又是「世界工廠」的中國旁邊，這個問題自然對台灣更為嚴重。

全球化對台灣的第二個挑戰，是為了維持自由主義資本體制，全球化開始有所謂的全球經濟調節機制，意圖透過建立多邊機制與其管理能力，以維繫這個自由主義

體制。台灣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世貿組織」的規則開始約束台灣本身的經濟政策自主性，對國家所管理的社會形成衝擊。三年前出現有關的百元米酒問題，以及年前曾判刑的「白米炸彈客」，都是對這個過程感受到被剝削或不滿的社會反應。

在民主方面，台灣出現如何建立有效的民主治理，以及建構一個鞏固的認同等問題。民主治理牽涉到建立一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以及有效率的政府。至於認同的鞏固上，台灣存在一個還在形成中的國家認同。一個明確的大多數還未形成，目前處於百花齊放的多元競爭階段。

由於台灣的民主發展歷程，是以一個素樸的「台灣優先」與「當家做主」為驅動社會在戒嚴時代走向民主化的動力，而在民主化後，民主政治，尤其是其中的選舉動員，又回過頭來形塑這個認同的內容。所以與西方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不一樣的地方，是西方國家在一個成形的文化認同上，發展國家與民主體制。但台灣的順序卻是先有民主體制的發生，繼而透過民主體制來確立國家的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何謂「台灣認同」。由於台灣走入民主化時間還不太久，民主體制與國家都還不太清楚，同時「台灣認同」還受到中國的強烈敵視，自然使得「台灣認同」在發展上遇到許多困難。

環諸台灣現在遇到的問題，與推動民主運動時的時空背景完全不一樣，如果在今天還是堅持當時的論述，自然是無法與這個社會的需要對話的。當時的民主化問題在於黨國體制，解決方式在於推翻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對人民負責，以台灣為優先的清明體制。當時既沒有今天遇到的全球

化問題，中國的影響力也不如今天，自然無須處理全球化與中國崛起所帶給台灣的問題。但這不是今天的現狀。

國際情勢的變化

以國際情勢來說，今天固然中國崛起是個事實，但以東亞地區來說，日本也在走向正常化，南韓正在轉變其與美國以及與中國的關係，美國也在檢討其東亞的戰略部署，以及調整其對中國的政策。印度也成為新的國際強權，東協正積極整合中。亞太地區的區域內貿易也超過其與美歐國家的數量。北韓有核武危機，台海問題也開始軍事化，香港更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些變化都不是台灣在推動民主化時所遇到的情形。

在這其中，中國崛起給台灣帶來的挑戰更甚以往。這不僅是中國對台軍事威脅及其能力的提升，還包括中國在亞太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以及其成為世界重要經濟體的事實，使得包括澳、德、法、新加坡、菲律賓、俄羅斯等等，都在注意中國的需要，在台灣議題上，消極來說是更不願意提升對台灣的關係，但更糟的是，這些國家開始會以責罵台灣來討好中國。2004年7月以後，當時台灣什麼話都沒說，但卻無緣無故被新加坡、澳洲等國指責台灣在破壞現狀，就屬於這種情形。

中國影響力的提升，影響了台灣在國際組織的參與，以及與其他國家維持邦交或非邦交的能力。而中國在國際上對台外交封鎖能力的提升，隨著全球化發展所衍生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使得國際組織的重要性更為提高。在此時台灣所受到的國際封鎖，以及無法加入（或無法有效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馬上嚴重侵蝕了台

灣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及建構一個永續家園的能力。這個層次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

這意味著現在的亞太區域，傳統的「現狀（Status Quo）」已經在快速的崩解。台灣民主化所出現的外交自主性，實際上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一方面民主化所強化的台灣認同，強化了台灣獨立的要求與正當性，二方面台灣民意對國外壓力也不是照單全收。1996年台灣民眾團結一致反對中國的飛彈威脅，在2006年為止，台灣國會已經有四十九次否決軍購案進入全會審查。這都是在民主化時無法想像的。

民主化所給予台灣外交的自主性，同樣也對其他國家形成新的策略要求。在今天我們所看到國際上對台灣民主化種種的解釋、讚美或責難，基本上都與既有的國際外交社區如何「調適」以便與台灣的民主相處有關。不習慣於接受台灣民主化的事實及其後果的人，由於無法攻擊台灣民主化的正當性，因此多強調台灣的民主是「民粹主義」，因為這個民主化會危及其一手創立與中國好不容易達到的「一中共識」，同時造成其管理台海議題的複雜性。

而將「民主」視為要堅持的價值的戰略社區，則認為民主使台灣相對於中國來說，有更為永續的政治發展能力，同時台灣民主也是促使中國走向民主的關鍵。因此會以更正面的態度看待台灣民主。但因為不能只接受民主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但拒絕對自己造成困擾的部分，基於維持民主價值本身，這些人認為要去主動了解台灣，以及民主對台灣及對區域所帶來的改變。過去我們會聽到零星有關是否對「一中政策」進行檢討的聲音，與這樣的見解

有關。

這兩種對台灣民主及其意涵的不一樣解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在提醒我們，台灣的民主化也是形塑後冷戰時代亞太戰略平衡的因素之一。中國對台灣的作為，台日關係最近幾年的發展，以及美國對台政策的變化，其實都是在「如何對待一個民主的台灣」這個議題上打轉。這個議題其後更與「美日中」強權的互動，台灣的戰略地位等結構性因素糾結在一起。如果沒有民主化，台灣注定在強權政治中只是一個被操弄的棋子，但民主化使得台灣民眾的意願有了出聲的機會，同時也給台灣的聲音有極高的正當性，無法被忽略。如果我們看到即使在2004年總統選舉時美台關係因公投議題而落入谷底時，其後美國還是必須調整其對台政策，包括明確提出台海問題只能以和平解決，要求台灣與中國不預設前提進行對話等項目，這些都與九〇年代後期美國的「戰略模糊」以及「中程協議」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總而言之，現在國際情勢對台灣的影響，以及台灣民主化對於區域局勢的反作用力，是台灣在進行民主化時完全沒有遇到的現象。

為何要堅持民主

環諸台灣所面對的內外問題、改革力量現在的困境，還有馬英九改造的新國民黨及其創造歷史論述的挑戰，實際上都回到一個核心，即台灣如何在民主的前提下，回應這些問題。這一方面與台灣在政治上無法走回頭路，民主已經成為社會的根本價值有關，同時也與台灣在國際上面臨中國的巨大壓力，以及全球化的挑戰，如果不堅持民主，不僅使台灣無以獲取生存的

國際正當性，同時也無法在一個有共識的基礎上，回應外界對台灣的挑戰，進而可能形成台灣社會內部的裂解，在內外交征的情況下，對台灣永續發展的基礎，造成內外夾擊與撕裂的慘境。

對內鞏固民主：民主治理與認同建構

堅持民主對內與對外的意義不太一樣。對內而言，主要在於如何鞏固民主。這牽涉到民主治理的強化。民主治理的強化又分為制度面與認同面。在制度面上，這意味著建立一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與改革政府的職能以及效能，使這個政府在平日與危機時都能有所作用，不會淪入民主癱瘓，進而走向「失敗國家」的命運。

在認同面上，由於台灣認同是一個還在流變與形成中的認同，這意味著這個認同的內容仍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與包含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這個認同還不足以成為凝聚國家共識的基礎。但台灣認同是台灣這個社會在面臨國家重大危難時，團結台灣以面對危機的重要關鍵。可是在認同本身還未凝固時，強化台灣認同的作為，可能要由「建立民主（Democracy Building）→建構國家（State Building）→建構認同（Identity Building）」這樣的方式來達到。換句話說，如何以透過民主來完成台灣認同的建構，並維持其內容的開放與豐富，是重要的關鍵。

對外求取生存：擴大民主社區

至於在對外方面，面臨外在的挑戰，台灣唯一可能的方式是堅持民主價值。這又包括堅持台灣自身的民主體制，以及在國

際外交實踐上呼應這樣的價值要求。

以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正在重新形塑的亞太戰略平衡，對台灣有利的是希望這個形成中的新戰略平衡是會有利於民主的戰略平衡。意即國務卿萊斯女士在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時所言：「Balance of Power in Favor of Freedom」。這包括如何在區域戰略的處理上，不時提醒美日等朋友，要鞏固既有的民主，同時也要擴大民主社區。換句話說，台灣的現實主義戰略操作的指導原則，是在於如何協助民主社區的擴大，創造一個有利於民主發展的區域與全球環境，給台灣的生存與發展一個較為有利的戰略機會。

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在對中國的政策時，台灣的重點就不能只是如何維持兩岸關係，而要將如何促進中國民主發展，列為台灣對中國政策的重點。兩岸對話的議題是否也應該考慮包括中國的人權問題等，使台灣的中國政策討論，不會再侷限以台海看待中國，並自我限縮於兩岸互動等問題上。

此外，改革力量對於中國也需要有新的看法。中國崛起已經是個事實，而中國的發展也有許多結構性問題。由種種跡象來看，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太可能維持目前生猛的局面，但是否會因為經濟發展無法解決其結構性問題，而導致全面崩潰，也在未定之天。對台灣而言，一個對台灣充滿敵意且強大的中國，與一個本身充滿混亂與趨向衰敗的中國，同樣都是台灣的重大威脅。

台灣應該以中國整體的未來分析為出發點，而不是針對兩岸互動的現狀發言，以免淪為只是反映目前問題的短線操作，也不要將中國問題與國內的認同問題混在一

起，因為對中國的政策並不是台灣的定位問題，也不應該是兩岸互動的問題，而應該在對中國未來角色的期待上，尤其是自2007年到2017年，中國由「胡溫體制」到「後胡溫體制」，這未來十年中國可能發展的預測等。這些都是應該著重的問題。

建構新的改革論述

在之前的討論中，實際上都談到一個現象，意即改革力量在推動民主化時的國內與國際圖像，與今天台灣所面臨的狀況十分不一樣。因此對於民進黨以及其他與進步力量有關的改革籲求，要進行根本反省的，可能是這個在推動民主化時所建構的改革論述，其分析的典範與知識基礎是否需要根本修正的問題。光是將討論層次放在清不清廉，有沒有理想等，可能還無法解決問題。

這個改革論述首先需要對民主化有個新的解釋。由於台灣的國家角色在今天出現變化，而社會的動力也與過去十分不同，往昔針對黨國體制所衍生的「國家 vs. 民間社會」二元對立架構可能有調整的必要，並在台灣發展的基礎上，以追問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國家機器，以及社會的實況，建構一個新的進步論述，否則這個二元對立架構，只會形成「國家都錯，社會都對」，或「國家萬能」的論述結果，沒有辦法處理問題。

其次，這個改革論述也必須加入對台灣民主化的國際脈絡解釋。正因為台灣民主化在今天不僅是個國內現象，也對於區域局勢形成衝擊，更是形塑新的亞太戰略現狀的重要因素之一，更由於台灣在今天面對這麼大的中國壓力與國際封鎖，尋求永續生存與競爭力的關鍵，是如何有效運用

台灣民主，以創對台灣的可能有利條件。因此對於台灣民主給予國際脈絡解釋，一方面可以防止對手以污名化台灣民主，來根本打擊台灣國際支持的基礎，二方面在於創造台灣對於區域一個新的戰略價值，提出台灣對於區域有何正面的貢獻，以及這個積極性意義對於形塑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有何正面影響。

再者，「台灣認同」與民主的關係可能要更深入的處理。民主在此是個程序的概念，認同本身則有本質主義的意涵。當然這也牽涉到「誰的認同」，以及「建構認同的過程」，甚至「認同」的內容也一直會出現流變，不是靜止的一塊。由於台灣現在必須透過民主建構來打造台灣認同，因此如何積極的建立這兩者的聯繫，是改革論述的當務之急。

創造新的「進步多數」

回顧這六年來政黨輪替的結果，雖然一路上顛撲蟄伏，跌跌撞撞，新手上路也有許多問題，但是台灣的進步卻是看得到的。這可由兩方面說明。

第一種是在功能性的進步。政黨輪替後，首當其衝的是原本的黨國體制，國民黨無法在黨政軍特一把全抓，同時台灣的公務體系以及司法體系也需要有所調整。在嚴厲的媒體與社會監督下，相對來說比較乾淨。雖然仍有相當多公務員是「泛藍」的支持者，但政黨輪替也還是逼使公務體系走向「政黨中立」的道路。由於這本身是政黨輪替所帶來的結果，與是由哪一個政黨進行輪替的關係不大，因此可說是「功能性」的進步。

第二種是民進黨執政後，與其執政價值連結所帶來的變化。以兩岸關係來說，在

李登輝時代的國民主流共識是相對於統、獨之外的「維持現狀」。但在追求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的主流民意開始朝向「住民自決」，以「台灣智庫」在2006年1月6日公布的民調顯示，九成民眾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並且包括統、獨都是選項之一。這就意味著在過去還偷偷摸摸不敢講的「住民自決」，在民進黨執政下成為主流民意。此外，「台灣認同」也在民進黨執政後過半，站穩六成的穩定多數。

除了國家認同問題外，民進黨在勞工政策、金融改革、公共建設等領域也都有重大成果。別的不提，中部科學園區自規劃到廠商進駐，前後共不到一年即完成，而預計於年底通車的高速鐵路、勞退新制、金改等議題，與世界上所有新興民主國家的進程相比，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反對黨首次執政後，都面臨做一任即下野的命運，而其過程更是沒有重大建樹。反觀民進黨在台灣人民的愛護下，不僅連任成功，同時也完成許多過去國民黨政府四十年不敢做的事情。因此放在世界的脈絡，台灣的政黨輪體的成就十分斐然。

現在執政黨在總統女婿「趙建銘風暴」面臨反對黨的攻擊下，似乎顯得欲振乏力。但是由趙建銘案例來看，這顯示的比較是個人道德層次的問題，而不是整個執政黨出現結構性的貪腐問題。此外，由於民進黨是台灣本土產生的政黨，不會無緣無故消失不見，因此步向「新黨」或「親民黨」等泡沫化的危機，相信在民進黨身上比較不會出現。

可是目前台灣的問題，反而是向商業邏輯投降的媒體，已經大到可以操作政治議程，立法、司法、行政都受制於媒體的形

象塑造，現在的媒體基本上不給予任何政策討論的公共空間。在「劣幣驅逐良幣」，以噪音掩蓋討論的情形下，媒體所出現的狀況是分不清楚是非，從而加深社會的政治對立與不信任感。而這個社會的氣氛也使既有一丁點的司法獨立幾乎蕩然無存。這種種現象的綜合結果，在本次「趙建銘現象」中集體爆發。

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陳總統或執政黨的清廉問題，而是民主能否持續的問題。台灣能否以內建的民主機制，以既有的法律制度來處理現在的問題，而不是上升到權力鬥爭，甚至企圖仿效2001年菲律賓「人民革命」的方式，以換掉某一位不受歡迎的領導者而告終。果真如此，

不僅意味著台灣的選舉制度是個玩笑，因為這表示對於選出來的領導者，可以因為不信任或不喜歡這個人，不是因為這個人犯法或縱容包庇不法，而要求下台。而這個結果更意味台灣民主體制的崩潰！

面對今天的民主僵局，以及不利的國際困局，經濟上的競爭與邊緣化的可能危機，如何在這個歷史的當口，透過對歷史動力的重新掌握，反省改革的知識典範，以民主為基礎，建立新的進步多數，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以民主對內形成新的社會團結，對外協助一個對台有利的戰略環境與定義台灣新的國際角色，需要共同努力。 ◎